

“天人合一”对世界瘟疫史研究的思想价值

高希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瘟疫的爆发与流行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相冲突的产物。纵观世界史上历次大瘟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不能和谐相处有关,与人们为满足私欲,征服自然、破坏环境、滥杀滥食相关。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之间不但相生相成,而且相伤相害。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天人背离,则必遭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无疑对根本化解人与自然、环境、自然之间冲突而达究竟和谐,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启示。“天人合一”不但对世界瘟疫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思想和实践价值,而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天人合一;世界瘟疫史;自然环境;生态和谐

中图分类号: K8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38(2021)04-0074-09

DOI:10.16140/j.cnki.ydxk.2021.04.012

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2019年年底开始流行的新冠疫情,都促进了人们对瘟疫史的关注。这些成果虽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人类现实的关注,字里行间充满着人文关怀。对世界瘟疫史整体而言,国内学者研究对于国外的研究叙述、介绍居多。例如武斌《人类的历史

与文化》等大作。^①国外学者对瘟疫产生的原因、蔓延及严重后果的分析更为深入。例如《瘟疫与人》《枪炮、病菌与钢铁》《传染病的文化史》等大作。^②对瘟疫的研究,在环境史、生态史、灾害史等领域也多有涉及。纵观相关研究,人与自然的的关系问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倡导保护自然、爱护环

[收稿日期]2021-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历史科学”(20@WTZ005),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LSYZDN2019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希中(1974-),男,山东阳信人,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工作。

① 武斌《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田勤、宋立新《疫病简史:小角色的大杀伤力》,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叶金编著《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杨红林编著《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杨大路编著《震惊后世的骇人天灾:恐怖大瘟疫》,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闵凡祥、张树剑主编《天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50场瘟疫》,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武斌《瘟疫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下文引用或参考同版各书,仅注书名、篇名和页码)

② [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罗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美]唐纳德·霍普金斯《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沈跃明、蒋广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爆发》,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美]路易斯·N. 马格纳《传染病的文化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李尚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英]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郑中求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

境、维护生态平衡是共有特点,但在问题的程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基于学界以往成果,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阐述“天人合一”对瘟疫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自2019年底在世界各地蔓延的新冠疫情,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大自然又一次给予我们的教训和警示。身陷这次灾难之中,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从根本上讲,人与动物、万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相生相成。一旦人的行为危及乃至伤害自然,打破生态环境的平衡,最终必将伤害人自身,甚至导致瘟疫大流行。追根究底,瘟疫等自然灾害都是人与自然相冲突的产物。如何从根本上究竟人与自然的纠葛,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天人背离与瘟疫的产生及流行

天人背离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一体”走向二分背离。从世界瘟疫史看,瘟疫等灾难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悲痛,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甚至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天人背离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瘟疫的产生与流行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例如人对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瘟疫随贸易或战争路线蔓延,甚至人为制造瘟疫,等等。

第一,环境与生态的人为破坏,是导致瘟疫产生的重要原因。世界瘟疫史表明,病毒与瘟疫的产生与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平衡的打破密切相关。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之间相生相成,相伤相害,则灾祸丛生。例如,世界历史上的霍乱大流行,至今共发生过七次,致上千万人死亡,而历次的暴发多与水体被污染有关。^①

第二,人们从疫区逃亡他处,加速了瘟疫的传播。在历史上,从疫区逃亡他处加速瘟疫传播的实例很多。例如,1830年俄国阿斯特拉罕的霍乱流行造成当地政府瘫痪,致使人们在恐慌中开始大逃亡。此次疫情在7月20日至8月15日进入高峰,死亡率高达90.8%。1832年至1833年法国发生霍乱,1833年1月,12万人几乎是同时离

开巴黎,约一万人逃离马赛。1834年6月14日,霍乱入侵美国纽约州,7月,纽约城的居民能逃的都逃离而去。这种大逃亡局面加速了瘟疫的蔓延,加剧了人员的伤亡。因此,在世界各国的防疫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隔离制度。这种制度和措施,至今仍在全世界不同程度上使用。

第三,贸易往来是瘟疫蔓延的重要途径。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对此做出了具体说明。1347年10月,热那亚商船队的12艘货轮穿过意大利最南面的默西拿海峡,停靠在西西里岛的默西拿港口,同亚洲的商人进行香料和蚕丝贸易。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带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这种瘟疫迅速席卷整个默西那,并像幽灵一般蔓延到西西里岛的南部和西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1348年1月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传染。意大利中部城市比萨也迅速被传染。从此,瘟疫向着意大利北部和欧洲腹地蔓延开去,最终导致了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瘟疫。

第四,瘟疫伴随战争蔓延。战争是潜在瘟疫的先锋和加速器,病菌常常沿着征战者的足迹前行。例如,当欧洲殖民者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给原住民带去了多种从未遇到过、因而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传染病,其中最致命的是天花。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1520年,天花随着感染者到达墨西哥,最终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1531年,皮萨罗率军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情况同样如此。天花已在1526年由陆路到达印加,杀死了其很大一部分人口,使皮萨罗在征服这个帝国时坐收渔人之利,印加帝国随之灭亡。^②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原住民大约有2千万至3千万人口,而到16世纪末只剩下100万。17和18世纪,在殖民者征服新大陆之后,西伯利亚、波利尼西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在欧洲细菌的攻击下不断崩溃。

^① 参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第77-107页;[美]洛伊斯·N.马格纳《传染病的文化史》,第91-96页。

^②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第207-208页。

第五 人之恶——人为制造瘟疫。根据学界研究,在中外古代战争中,为了打败对手存在人为制造瘟疫的情况,但这属于非科学性的生物瘟疫。但这种情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研制并利用生物武器,人为制造瘟疫,已经应用于战争,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1935年,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731部队在哈尔滨成立。他们研究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同时从事细菌的大批量生产、贮存和战场实验。它们不仅在活人身上做实验,而且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内脏的感染情况,残忍至极。同时,731部队多次将其制造的病菌用在侵华战争之中。例如,在1942年浙江战役中,后撤的日军将不计其数的病菌倾倒在井、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不仅导致中国军队的重大伤亡,而且导致更多的无辜百姓受灾。^①

由于生物武器的反人类性质,1975年,世界主要国家修订了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使用生化武器议定书,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得研制和持有生化武器。但通过一系列相关恐怖事件看,有些国家仍在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因此,利用生化武器人为制造瘟疫,仍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在世间,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制造瘟疫更为恐怖,尤其是在当今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不仅拷问着这种行为的最终后果,也拷问着人自身的德性和最终归宿。

第六 天人背离,灾害丛生。天人背离是“天人合一”反面,指人对动物、植物、自然、环境的伤害、破坏、污染等负面行为。正是由于这种天人背离的行为,灾害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而瘟疫就是其中最为严重之一。瘟疫所致伤亡以亿计,动辄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的可谓比比皆是。据估计,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

至少占到总人口的20%,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总和,而新型瘟疫如艾滋病等正在加剧这一数目的增长。^②例如,在1347-1353年,至少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自1981年至2006年,全球超过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③可以说,瘟疫就是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绞杀的可怕灾难,瘟疫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沉痛史。瘟疫流行不但导致患者身心剧痛和社会恐慌,而且由恐慌可能导致大逃亡、暴力乃至极端事件的发生。同时,不仅给所经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往往导致国家动荡,改变前行的轨迹,甚至亡国灭种。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即是如此。此时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在政治、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达到了前人无可比拟的高度。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但随之而来的瘟疫吞噬了雅典1/4到1/3的人口,摧毁了雅典的整个社会结构。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也可能因感染瘟疫而死,公元前404年,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从而宣告了古代西方文明黄金时代的终结。^④

上述六个方面,前人之述备矣。在此本文再次赘述,无非是强调:瘟疫产生与传播蔓延的原因众多,但都与人有关,人自身有着逃脱不掉的责任,尽管历代和当今世界各国的人们可以说出不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当今,人与自然愈来愈严重的失调和愈来愈尖锐的矛盾,对人类社会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其突出表现就是全球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近些年来的历史研究,要么聚焦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历史规律的探寻,要么热衷于具体细节的考辨。尽管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整体上忽视了对人生命的真正关怀,忽视了人所依存的生态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学界人文精神的缺失,这种情况亟待改变。纵观世界

① 参[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第181-183页;徐焰《战争与瘟疫》,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8-169页。

② [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第10-11页;叶金编著《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附录:人类瘟疫大事记》,第198-208页;杨红林编著《历史上的大瘟疫·附:人类历史上有明确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的瘟疫》,第241-242页。

③ [英]玛丽·道布森《疾病图文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苏静译,金城出版社,2016年,第12-17、314-325页。

④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第207-208页。

瘟疫史中那些数以亿计逝去的生命,我们应该惊醒,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而使一幕幕悲剧不再重演。这就要求我们放下自身傲慢与偏见,去珍爱生命、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维护生态的和谐平衡,否则,谁又能保证我们不是下一场灾难之后的累累白骨。

二、“天人合一”对瘟疫史研究的究竟之处

“天人合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儒释道有着不同方式表达,但核心思想一致,也就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自然和人生问题。“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以及维护生态和谐的积极一面。

“天”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司马迁之前的《周易》《尚书》等典籍中已多有记载和阐述,后人也多有阐发。^①“天”有多种涵义,总体而言,主要意思有三:第一,主宰之天;第二,自然之天;第三,义理之天。^②而“一”一方面被赋予万物之本源、万物之始的意义,例如《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说文解字》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④另一方面,是万物之整体为“一”的状态,绝非割裂,绝非对立。虽然物象各有差异,但穷其本源,万物皆归于“一”。这也就是《庄子·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⑤《肇论》所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⑥

在中国文化及思想史上,“天人合一”这一词语虽提出较晚,但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例如,《周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

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⑦汉代天人合一观念有进一步的发展,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⑧;“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⑨宋代二程则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⑩张载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⑪“天人合一”表明天人不但在本源上统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有机整体,绝非二元对立。

(一)人与自然状态下一而非对立。人与动植物都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都是大自然的物种。人与生态环境合于自然这大“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不是二,不是根本的“对立”。恩格斯在1873-1882年撰写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提出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及和谐相处的观点。他说:“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⑫

纵观世界瘟疫史,我们也看到“万物”之间为“一”不为“二”的关系。在抗击病毒、防治瘟疫的过程中,在疫区的所有人、动物及环境之间,绝不仅仅是个人、单一的关系,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也就是“一体”的关系。疫情无国界,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还是单个的国家,都不能独善其

① 参李申《儒教敬天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石磊《儒教天道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张二远《天命人性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② 汤一介、[法]汪德迈《天》,岳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③ 《老子》,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08页。

④ (汉)许慎《说文解字》,岳麓书社,2006年,第7页。

⑤ 《庄子·齐物论》,孙海通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39页。

⑥ (东晋)僧肇《肇论校释》,张春波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209页。

⑦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乾》,第17页。

⑧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页。

⑨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第153页。

⑩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⑪ (宋)张载《张载集·乾称篇》,中华书局,1978年,第65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999页。

身。整体防御、防治才能较快遏制病毒的蔓延,最终战胜瘟疫。这在2003年“非典”疫情和自2019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的防治上看得很清楚。在防治过程中,全国全球一盘棋生动展现着人人、社会、环境等的“一体”关系。

(二)人与自然万物构成“一体”生态系统。“天人合一”告诉我们,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息息相通。具体而言,人与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空气、水、矿物、土壤、宇宙等万物构成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行。^①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就处在包括微生物、动物、环境、自然等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而病毒是已知最小的微生物。科学家从一块距今9000万年的鸟类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②这也就是说,自700万年前人类诞生以来,病毒就与人类相伴随,而麻风与天花则被认为是两种最为古老的瘟疫。

在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中,一旦由于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变动,超过了该生态系统的负荷,就会打破平衡,甚至其中一个细微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例如,就人被病毒感染而言,就是其自身小生态系统的打破。更令人可怕的是,某些病毒攻击了个人之后,却可以将疾病演化为群体性的瘟疫,并在大范围蔓延开来。在交通工具极为便捷的今天,尤其如此。2003年非典,2019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即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着的世间悲剧。

(三)人仅仅是自然的产物,绝没有超越自然之上。在人类产生以前,地球已存在约46亿年,自地球上出现生命开始,也已约38亿年。地球上的微生物、动物、植物等也远远早于人在地球上的历史。大约700万年前在万物构成的生态系统中

产生了人及人类社会。^③所以,我们人,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④与地球46亿年、生命38亿年的历程相比,人在庞大的生物系统中,只占十分微小的一部分。

人不但因自然而生,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也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人必须依赖自然界提供生活资料才能生存,如阳光、植物、动物、土地、空气、净水等等。^⑤如果失去这些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人的生命就得不到保证,何谈生命的发展和超越。因此,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绝不是超越自然之上的独立存在。因此,我们应对自然万物怀有感恩之心,而非怀着邪恶之心去戕害它,怀着无尽的贪欲去污染它、破坏它。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叫“人类中心主义”。^⑥从整个世界瘟疫史、生态史来看,这要么是自不量力的胡言乱语,要么是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这种观点以人自身出发,以人自身为圆心画圆,自感高其他动物一等,就随意践踏其他生物的生命,但最终招来了屡屡灾难。灾难之严重,伤亡之巨大,即使大的战争,也难望其项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⑦我们必须反思那种把人与动物、环境、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反对征服自然的思想及行径,反对“唯人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动物、万物、环境是一个紧密关联、相生相成、互为制约的生态系统,统一于自然这个“大一”。人只是大自然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的历史也只是自然大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历史研究未来的一个重要突破方向,就是把人当作大自然普通的一员来研究,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由此重新思考、界定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关系,抱着敬畏

① 参[丹]S. E 约恩森《生态系统生态学》,曹建军等译,科学出版社,2017年;[美]小曼努埃尔·C.莫里斯《认识生态》,孙振钧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② [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第9页。

③ 参[法]伯特里克·德韦弗《地球之美》,[法]让-费朗索瓦·布翁克里斯蒂亚尼绘,新星出版社,2017年;[日]日本博学俱乐部:《地球简史》,黄少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

⑤ 著名生态学家康斯坦赞(R. Constanza)等,将地球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分为17类,即大气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调节、水储存、控制侵蚀和保持沉积物、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废物处理、传粉、生物防治、避难所、食物生产、生产生活原料的提供、提供基因资源、休闲娱乐、文化塑造功能。(参卢风等《生态文明:文明的超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⑥ 余谋昌等主编《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8-47页。

⑦ 《庄子·秋水》,孙海通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251页。

之心,与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才是上上策。

三、天人合一,生态和谐之根本路径

自古至今,瘟疫给许多地区和国家带来了猛烈的冲击、严重的灾难。它以巨大的生命伤亡和穷凶极恶方式教训着人,促使人们去不断自省。尽管反省的够多,但反省的依然不够,否则,为何灾难还会一次又一次降临。面对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系统的危机、大瘟疫的横行,诸多学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的改进”。^①不论是道德改进的呼声,还是道德改进的行为,都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但这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就是不论在生态环境、生态伦理的认知上,还是在动植物保护、大自然爱护的实践上,力达“天人合一”,止于至善,才更为彻底。“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一体性,为人与生态和谐的审视和重构提供了根本路径。

(一)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在全球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征服”,征服他人,征服他国,征服自然。就征服自然而言,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这种“征服”自然及其所造成恶果的过程都在加快。世界各国通过对自然的利用、征服、控制、支配,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自然资源遭到无情地破坏。无序、过度地开发和利用,严重破坏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使生态严重恶化。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膨胀、资源紧张、河流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雪山融化面积扩大、两极冰山加速融化等等,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同时,人口、消费、浪费、垃圾、排放物等呈指数增长,导致自然资源和动物种群呈指数递减,野生动物正在广泛地遭受生存窘境而加速灭绝。^②更为严重的是,所有这些过度和失序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造就了舒适的温床,为瘟疫的产生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为大瘟疫的爆发创造了无限可能。

就拿历史上的大瘟疫来说,都与动物、环境、自然等之间关系的背离密切相关。例如,人与家畜、野生动物的紧密联系,尤其是狩猎和食用肉食,为感染源在物种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所有条件,从而将人置于有可能爆发病毒感染的世界。而事实也是如此,源自动物的许多传染病表明,动物是新病原体的重要来源。多数情况下传染病都由动物传给人,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麻疹和霍乱等。^③当今,“新流行病出现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与野生哺乳动物的密切接触。”当人们在微生物丰富地区捕获宰杀野生动物时,我们就面临了能够导致一些新型感染病毒出现的情况,而这些感染病毒能够毁灭整个世界。^④

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在全世界显露无遗,有目共睹。自2019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在全球的蔓延,再次警示我们,要深切反思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现在,更关系到后世子孙的未来。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⑤但许多国家及那些利益熏心的人们,并没有听到或履行恩格斯的警告,结果就是诸多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确实已经并正在经受着自然的报复,例如旱灾、洪水、海啸、台风、飓风、瘟疫等灾害。自2019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正在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地蔓延肆虐,给我国及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严重程度难以想象。可以说,当今全球社会的生态危机,无不是功利主义私欲漫无节制的产物。俗言:人有千算,天有一算。瘟疫,尤其是历史上的大瘟疫,就是天之一算。这一算就会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重大灾难。因此,我们须放下人自身

① 参[美]大卫·雷·格里芬《空前的生态危机》,周邦宪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

② 参传奇翰墨编委会编《毁灭启示录:它们正在灭绝》,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英]蒂姆·弗拉克摄影、[英]乔纳森·贝利、[英]萨姆·威尔斯撰文《濒危:我们与它们的未来》,[美]林肯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③ 参[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第231-232页;[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第192-206页;[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第43-45页。

④ [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第223-2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

的傲慢与短见,放弃征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在此,“天人合一”对处理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关系问题,不论在形而上道的层面,还是在形而下术的层面,都给予我国及全球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建设以深刻的思想启示。

(二)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无可否认,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科学方法和医学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抗击瘟疫的强大武器。但这也需要辩证看待,毕竟独木难成林。

第一,对于防护、治疗瘟疫,医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防治病毒疫苗的研究和诞生,以及那些在一线救治病人的白衣天使。他们的付出乃至牺牲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例如发明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素、喹宁的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塞尔曼·瓦克斯曼等等。

第二,事后性。从历史上历次大瘟疫的爆发及防治看,疫苗的研制具事后性一方面,疫苗的研发速度常常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另一方面,很多病毒导致的疾病超出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①也就是说,未来一些不可知病毒可能会随时跳出来,演变成瘟疫,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言:“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龕中解脱出来。”^②因此,那些积极主动的防患于未然的方式,在瘟疫尚未萌生未起之时,就显得很是特别重要,那就是通过与自然万物为善的路径达“天人合一”。从世界瘟疫史来看,这是事前最为保险的方式,否则,有谁能保证灾难不会重演呢?

第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防治瘟疫,又可利用科技制造瘟疫危害人间。这在世界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上都有触目惊心的表现,例如前述日本731部队的恶人恶事恶行。由此可见,科学技术解决不了人心、道德和至善的问题,

脱离道德关怀和伦理约束的科学技术,越有用,危害可能越大。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医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由正知正念的引导,否则,可能会失去正向的价值引导,从而为祸人间。

(三)天人合德,止于至善。以德配天、与天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要义。天地之所以成其大,在于能够容纳万物,育化万物。如《周易》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③《论语》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④天人合德是指人应该效法天德,与天合德,自觉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

其一,在德性上天与人相一致,相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也就是在德性上天与人相统一。例如《周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⑤《诗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⑥这就确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人的价值所在。

在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无不教人向善。人人向善,与天地合德,是消除自然灾害的根本途径。就拿瘟疫史来说,如果仅仅只看到瘟疫对人类的伤害和绞杀,似乎还不全面。反过来看,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是否反思人对于动物、环境、生态和自然的伤害或破坏。这点,在不同层面的动物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那里已经有着较好的认知,但仅仅他们还不够,应该有更多的人们去反省,自觉地去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在与它们的和谐相处中创造美丽的家园。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天人合德。

其二,天地自然依赖人助其“化育之功”。《周易》将天地人并称“三才”,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⑦天不知多高,地不知多厚,人身不过数尺,寿不过数旬,竟与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称三才,何也?天地虽能生成万物,若无人以参赞教育,则不

① [美]内森·沃尔夫著《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第12页

② [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236页。

③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系辞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④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阳货》,第2526页。

⑤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乾》,第17页。

⑥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大雅·荡之什》,第568页。

⑦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说卦》,第93-94页。

成世间大道。人能赞天地之化育,继往圣,开来学。所以,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人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①也就是说,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助天地“化育之功”,而造福于人及人群、社会,乃至民族、国家、人类,创造文化文明,推动社会进步。

其三,仁民爱物。仁民爱物,与动物、环境、自然和谐共生,是“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这在儒释道经典中有着丰富的阐述,例如:

《论语》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③

《孟子》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④

《礼记·王制》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⑤

《礼记·月令》言:在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母卵。”在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在季春之月,“修利堤防,异达沟渎,开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置罟罗网,毕翳,蝼兽之药毋出九门。”^⑥

《太平经》言:“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⑦

另外,在道家和佛家中“戒杀”作为前五大戒的“第一大戒”。

上述种种,都是把仁爱慈悲之心扩大到自然万物之中,从而维护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和谐

与平衡。正是由于儒释道中的此类思想和作为如此丰富,所以诸多学者将其引入到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并加以倡导。^⑧纵观世界史上的历次大瘟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不能和谐相处有关,与人们为满足私欲,“征服”自然、破坏环境、滥杀滥食相关。所以,古今中外的那些大德贤圣倡导并规劝人们慈悲戒杀。这对当下及未来人与动物、环境、自然和谐相处,对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祸患不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

(四)中道圆融,取之有度。如果说“天人合德”是人与动物、环境、自然在德性上的“路径”,那么“中道圆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人类利用自然应该有一个限度和界限,适可而止。无休止地利用,乃至征服、破坏自然,必将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伤及人自身。由历史上的瘟疫等自然灾害看,^⑨人定胜天否?人征服了自然否?答案是否定的。由此,持中道圆融的态度和方式是可行路径。中道圆融具体体现为中庸、中和。中道圆融是指处理问题的适度境界和状态,既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也包括人与外在、外物、外境的和谐,从而把天、地、人、物、我圆融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

其一,中庸。“中庸”即中道,适度,无过无不及,绝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折中主义,而是一种恰如其分、善巧适度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这在《中庸》中也多有阐述,例如:

仲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①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第1632页。

②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述而》,第2483页。

③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梁惠王章句上》,第2670页。

④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尽心章句上》,第2771页。

⑤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王制》,第1337页。

⑥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月令》,第1357-1363页。

⑦ 《太平经》(全三册)杨寄林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600页。

⑧ 余谋昌等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傅治平《天人合一的生命张力: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年;吴承笃《天人合一:齐鲁文化与中国生态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李永峰等主编《生态伦理学教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张云飞《天人合一:儒道哲学与生态文明》,中国林业出版社,2019年。

⑨ 参传奇翰墨编委会编《毁灭启示录:自然的惩罚》;胡杨《人类灾难全档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①

其二，中和。《中庸》开篇即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②《周易》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③由此可见，中和可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生生不息。

其三，中道圆融是破除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二元对立的良方。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人们除了与自然斗争外，尚把人与自然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无论是个人之间、族群之间、阶层之间，还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这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仍不太平的重要原因。对此，中道圆融无疑给出了中国文化的答案。如果说中道还是一种处事的适宜尺度的话，那么由中道进而“圆融”更为关键，因为只有“圆融”，才能最终“归一”。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深受瘟疫蹂躏之苦，许多国家亲眼看到环境改善在防止瘟疫中的良好效果。这就从实践上证明，“天人合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瘟疫的防治。所以世界各国在现实生活及治国理政中，越来越注重自然环境、公共卫生的改善问题。这本身就是“中道圆融”的具体表现，就是向“天人合一”的回归。在生态危机日

益严重的今天，中和、中庸、中道圆融等思想及作为，无疑为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智慧和经验。

综上所述，无疑“天人合一”思想、实践、作为和经验，为预防瘟疫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借鉴。但迄今为止，这种借鉴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且仅仅高度重视还远远不够，而是要将这些思想实实在在见之于行，否则，仅仅坐而论道，浮于空言，“天人合一”终究不会实现。一方面，“天人合一”要成为社会大众的自觉行为。若人人心存对大自然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从自身做起，那么涓涓细流终究汇集成河而成社会风尚，人与动物、万物、自然必定享有更多的安宁和欢乐。另一方面，仅仅道德约束而缺少严格的法制约束与治理，仍然难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及生态的平衡，因此还需要治国理政中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的严格落实，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总之，“天人合一”不但能够弥补唯科技论的不足，起到正视人心的重要作用；而且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良方，克服人与生态环境二元对立的根本路径。不论从世界瘟疫史的长时段看，还是从2019年年底流行的新冠疫情看，世界各国都会在疫情应对上作出自己的回答。毫无疑问，我们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一定能够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最终胜利。但是，胜利之后，我们的健忘症是否会很快发作而忘记曾经的疼痛，还是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瘟疫等悲剧的再度发生。若是后者，走“天人合一”之路，则是中华文化给予世界瘟疫史研究及未来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智慧。

[责任编辑：王志跃]

①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第1625-1626页。

②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第1625页。

③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乾》，第14页。